

高教视野

〔2017〕第12期

贵州大学学校办公室编

2017年12月1日

本期要目

【学习十九大】

- 1 教育部长陈宝生讲党课
- 2 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破”

【高教要闻】

- 3 “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
- 4 十九大后首次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 5 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高教观点】

- 6 新时代，如何推动教育治理与教育法治
- 7 高校思政工作的四项重任
- 8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论自觉与教育自信

【信息摘编】

- 9 我科学家斩获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 10 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聚焦一流本科教学

【学习十九大】

开讲啦！教育部长陈宝生讲党课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11月16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讲专题党课。

党课在教育部机关礼堂设主课堂，各直属单位设分课堂，在京部党组成员和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在主课堂听课。党课前，陈宝生带领主课堂全体党员面对党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在陈宝生领誓下，所有党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陈宝生在党课中重点围绕十九大主题、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陈宝生指出，大会主题打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打通了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打通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打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打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大会的方向和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论断，既是总体性、阶段性判断，也是战略性、理论性和世界性判断。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从革命、建设、改革三个维度，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从理想和信念结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结合我们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现状、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供需关系逻辑来深刻理解。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围绕时代主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对三大规律的探索 and 认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深刻理解。

陈宝生希望，教育战线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认真思考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特点、过程和模式问题，抓住契机，深入探索，积极推动教育战线理论学习、教学和研究取得新进展。

除主课堂外，还有近 2000 名党员干部在分课堂通过网络直播收听收看本次党课。

(《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2 日)

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战略判断非常符合我国教育实际。教育涉及每一个人，关乎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针对问题解决矛盾、心系目标完成使命。

成就铸起新时代 使命开启新征程

36 年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如今，中国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多元而旺盛，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既注重发展生产力，也着力加强社会建设。

1981年，我国刚刚走向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尚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统计资料显示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89元，教育财政总支出1114.97亿元，初中毕业生升学率35.5%（1983），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127.9万，当时没有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但即使到1990年毛入学率也仅为3.4%。

而到了2016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教育投入和结构已然形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3980元，全国教育投入3.89万亿元，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3.7%，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2.7%。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这些变化的取得，得益于我们的道路与政策。在党的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指引下，教育界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完善依法治教制度框架、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体制、多元办学、结构优化等重大改革领域取得突破，在两基攻坚、高校扩招、重点建设等关键发展点取得跨越，在保障质量、促进公平、服务社会等内涵提高方面取得进展。

特别是近5年来，教育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攻坚克难、锐意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公平质量主题，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中国教育总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教育保

障条件显著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大。

从制度到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通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砌墙筑顶等扎实有效的基础性工作，我国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切实实现了优先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支撑了国家的发展。

教育的新时代是以成就而铸就，教育的新征程将以使命而启程。

教育发展面对的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供给是如此短缺，而今已是非常丰富，但仍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事业前进中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不平衡不充分。**

不平衡指向发展起来后的短板，虽然事业整体发展了，但仍然存在有高有低现象，这种现象大家容易看得到，但解决起来也难以一蹴而就；不充分则指向某类发展的欠缺，也就是发展得薄弱和不够的地方，这里有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阶段而逐步呈现出来的新问题，也有难以快速攻坚的长线老问题。

不平衡是整体中的局部，不充分是部分中的总体；不平衡一般与短板相连，不充分多数与热点相关。它们都是教育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使命要求。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梦想实现，越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困难和挑战。**经梳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有六个方面。

不平衡主要有：

第一，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大国，地理条件迥异，在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多种形态并存，区域间各级各类教育在办学理念、投入、条件、标准等方面都差异巨大，“孔雀东南飞”现象严重，这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

第二，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巨大，许多时候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差异极其显著。

第三，本地区校际发展不平衡。在过去物质短缺时代，学校的重点建设使得基础教育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理念上出现了不小差距，时至今日也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县域内义务教育不均衡、城区内中小学条件水平不平衡现象，择校、大班额问题是百姓心中绕不开的结。

第四，教育结构发展不平衡。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和弱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经济结构还不匹配，毕业生就业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平衡。智育一枝独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思维、身体健康成长、审美观、劳动意识和动手技能等培养训练环节不同程度地被知识学习的时间挤占了。

第六，家长对教育的心态不平衡。中华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这是好的，但很多人对优质教育的理解、预期存在误区，由此造成了广大家长对择校的追崇和攀比现象，特别是当看到自己的同事、邻居等熟人子女择校时，就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心态。

不充分表现在：

第一，先进教育思想培植实践不充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面向未来，我们的很多教育理念还比较陈旧，人才培养模式相对于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死记硬背式的知识点学习、应试现象还比较严重，素质教育思想还没有在实践层面得到有效落实。

第二，教育支撑国家战略发展能力不充分。现代教育体系尚不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和能工巧匠仍是人才培养的短板，特别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来临之际，面对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等方面还未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国际教育治理参与不充分。随着我国教育的由弱到大再到强，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因此需要创新方式，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多边合作等阵地，推广我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标准，树立我国在国际教育治理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目前还远远不够。

第四，教育公平推进不充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相对于过去教育的快速发展，公平的缺口更大，机会公平对获得公平的心态影响过大，当然公平问题也是与不平衡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五，教育内涵发展不充分。过去在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重视了教育的规模发展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但长期的惯性思维使得大家对于育人内在的东西关注不够，教育外延扩展冲动依然强劲，质量、内涵等常常流于形式和表面，多样化选择不够，不同学校的特色不够鲜明。

第六，依法治教实现不充分。依法治教需要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我们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管理、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方面，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还有差距。

以问题为导向竭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要

当前，中国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陈宝生部长提出，“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

我们必须高质量开展教育大厦的“全面施工”工作，高标准绘制内部“装修设计”的美丽蓝图，以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满足社会多元需求，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出现问题就必须给予解决。问题与成绩也常常相伴共存，因为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常常带有阶段性甚至长期性特点，既是过去攻坚的重点，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需要针对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升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实现教育事业“精装修”。

为此，必须紧紧围绕教育的质量、公平中心议题，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打好解决短板问题、突破关键环节的攻坚战。

坚持方向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将德智体美全面纳入育人过程；

完善教育体系，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分流选择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高等教育高水平

多样发展、继续教育终身学习发展，增强各级各类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和特色内涵优势；

力补教育短板，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西部地区教育、校企合作育人、创新创业教育、教育扶贫攻坚、薄弱校改造、教育标准制定等工作，推进教育由大到强；

注重关键能力，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强化思维训练，引导学生搭建起合理的智能结构。

解决问题需要精准用力——找准问题，针对问题的关键和症结，对症下药，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需要科学用力——遵循人的成长规律，以青少年身体发育成长和心理健康发展为基础进行，以专业水准要求按教育规律办事；

需要持久用力——教育是内化于心的事业，需要驰而不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方能看到成效。

解决问题还需要有责任心、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以党的宗旨、国家发展目标和人民根本利益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行动指南，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克服困难，把个人事业融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之中。

以目标为导向谋划 2035 年的教育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如果说，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打好决胜攻坚战；那么，面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需要更多以目标为导向谋划未来发展。其间的过程就是由目标导向不断推动教育问题解决的征程，即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工程。

问题导向主要指向公平质量和体制机制，目标导向需要预测社会、国际、科技发展前景而指向育人模式及其制度保障，二者有着极强的相通性，但判断的依据不同。

党的十九大对国家发展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阶段目标，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如何实现教育的优先发展命题，以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己任，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斗争和伟大事业。为此，我们需要：

以民族复兴的梦想确立教育的理想

祖国的昌盛、民族的未来就是教育的理想及其目标制定的依据。教育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

今后一个阶段的教育发展，必须遵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两个阶段”和“两步走”的总体要求进行规划安排。

以教育目标为导向清除发展征程中的障碍

未来是一个由目标看问题、实现目标解决问题的过程。以目标为导向必须在全球经济、科技革命大格局下思考社会的变化和教育的变革，比如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网络技术对治理变革的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文明走向的推进等。

趋势判断尤为重要，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未来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本身，我们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必须有创新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以教育规律为遵循致力于人的健康成长

在未来发展中人是第一位的因素，因此必须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就像一棵果树，浇水、施肥、嫁接、修枝、开花、授粉、防虫、结果、收获是有规可循的，欲速则不达，不能揠苗助长。

心理学、认知科学是教育学的重要基础，智能结构、迁移理论学界已有共识，我们的教育教学安排需要参照他们的成果。人才培养应当关注思维、创新、技能等影响学生终身发展的关键能力，不能仅在知识点记忆上耗时间，要注重搭建合理、科学的智能结构，以更好地实现人的能力迁移。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的理想，也是广大学生家长的共同愿望，因此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期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只不过很多家长都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逐步强化了应试教育。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规格标准和内涵特色的结合，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扩大优质和多样的教育供给；另一方面要合理引导家长预期，宣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科学教育观念，让大家明白合适的教育才是最美好的教育。

以教育优先发展支撑国家现代化未来

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教育兴则科技兴、则经济兴、则国力旺；中国当代自身的发展表明，教育既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也是国力增强的强力推动者。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现代化必将先于国家现代化而实现。以上互为因果，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教育与社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协同发展，共同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教育》，2017年第21期）

“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进如新时代 在新时代谱写“双一流”建设新篇章

11月19日,《人民日报》观察版刊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三位教育专家的文章,聚焦如何科学把握“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具体路径。

杜玉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彰显了党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选择建设路径,适应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同向同行：“双一流”建设应承担的国家责任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首要问题,也是高等教育领域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前,加快“双一流”建设,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出发,明确定位、谋划方略、砥砺前行,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担当意识承担好对国家的责任。

巍巍上庠,国运所系。从期望教育救国、教育兴国到今天建设教育

强国，中国的教育一直心系国家，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使命担当。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强盛总是伴随着教育的强盛。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从1995年11月启动的“211工程”到后来实施的“985工程”，2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懈努力，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保障。当前，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恰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意义尤为重大。“双一流”建设应该也必将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保障。

把“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新态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新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通过一系列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把“双一流”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让所有办学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所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创造力全面释放，使高校进一步履行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使命，使高等教育在助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向同行。

引领引导：“双一流”建设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特别是当前重点推进的“双一流”建设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样，既包括对物质财富增长的需要，也包括对美好生活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的需要，同时还包括对优质、发达、丰富、可供选择的教育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享受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历史使命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双一流”的建设目标，既要顶天，也要立地。“双一流”是顶天的，要引领世界科技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前行；要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要推动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交流互鉴；要把教育目的聚焦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上。“双一流”又是立地的，要把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要引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回应社会关切、关注民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和优质人力资源的第一提供者，责无旁贷地要成为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等教育的代表；责无旁贷地要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造就一大批投身国家经济建设栋梁之材的榜样。

在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中，**“双一流”建设高校还要责无旁贷地主动发挥引领作用。**“双一流”既是一个突破性工程，也是一个引领性工程、示范性工程。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要发力点。要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实施，促进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和基础能力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引领中西部高校创新发展；通过“双一流”建

设，引领和带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整体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做强整个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崇高奋斗目标，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每一所高校、每一位学生。

要旨要求：“双一流”建设应承担的教育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开启的“双一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根植于本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在内涵、品位和精神气质上下功夫，需要在“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的结合上下功夫。

建设“双一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我国大学应牢牢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核心使命，真正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精神的思想基石，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大学育人的独特优势，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大学领导体制的核心坚守，把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依托。这些是“双一流”建设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涵，我们要牢牢把握。

建设“双一流”要注重大学和学科两个一流协调并进、内涵式发展。建设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一流学科，但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简单等同于一流学科建设。应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基础和办学实力差别化发展。一流大学未必都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精而专、有特色的大学同样可以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学科建设要坚持有所选择，有特有强、有交叉融合、有高点高峰，形成优势带动、多元发展、交融并存的良好态势。说到底，建设“双一流”重在

质量和特色，绝不是规模和数量上的比拼。

建设“双一流”要注重以贡献求发展，积极发挥“双一流”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不能把建设方案搞成科研方案，不能把学科建设当成课题任务，不能把争创“双一流”看成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竞争和实力比拼。对是否属于一流的考核和评价，不能主要依据论文数、经费数，而要考虑大学和学科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实际贡献。要重视培养的学生是否真正适应社会需要，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否确实具有社会价值、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遇。高校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进行改革创新，努力完善体制机制，切实扭转单纯依靠加大投入的粗放型发展局面，通过改革提高建设效益，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

潘懋元

厦门大学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双一流”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吹响了新时代“双一流”建设的号角，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一流大学不仅体现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而且象征一个国家科学与文化实力。在没有各种大学排行榜之前，一流大学或著名大学是社会对一所大学的整体评价，其根据是一些不成文的社会共识：**一是有卓越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而且能够一以贯之，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柏林大学等都是如此；**二是教师水平高**，有一批大师级教师，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虽然是所小型学院，却拥

有众多院士；三是学生整体素质高于一般大学，并且培养出一批有突出贡献的著名校友，如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小型师院就因为培养出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以及著名的文化总统蓬皮杜而受到世界关注。

由此可见，一流大学既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既可以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学院；既可以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老牌大学，也可以是锐意变革、勇于创新的后起之秀；既可以致力于培养世界领袖，也可以专注于锻造工程巨匠。一流大学的精髓在于拥有一流的办学理念，而一流大学的个性则体现在使命担当、战略选择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上。无疑，一流大学既有共性又各有特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但是，自从西方国家的大学排行榜盛行以后，一流大学就基本被固化于若干所精英化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也是以西方国家的大学排行榜为标杆。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应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新时代加强“双一流”建设，要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目标**，既建设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又激发不同类型高校争创各种类型的一流。其实，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都有争创一流的潜质。传统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在某些领域具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同样有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坚持统筹兼顾、多元发展。

大学与学科休戚相关。一所一流大学必然拥有一个或数个一流学科。

从世界范围看，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但学科齐全并非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不少高校从建校之初就选择有限的几个学科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并举全校之力将其发展成为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其创立之初仅创设土木系、机械系和化学系三个系，该校的办学目标定为在有限的领域培养引领世界科技变革的先驱者。同时，诸如加州理工学院、印度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莫不是凝聚合力重点发展有限的几个学科，据此成为闻名于世的一流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流大学的根基在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不应局限于研究传统的“高深学问”。“**双一流**”建设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根本指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因此，一流学科建设应立足现实问题，有自己的价值标准。

“双一流”建设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发展生态，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必须辅之以多样化的发展标准。一个合理的高等教育系统犹如一支乐队，既要有钢琴的演奏，也需要大、小提琴等的参与，如此才能奏出完美的乐曲。每一种类型的院校和学科都各有所长，都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从大学演进史看，几乎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依照固定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无一不是在漫长的探索中实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引导有实力的地方院校根据自身特色和区位优势，设定差异化战略目标，激发地方政府、行业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性，实现大学、政府与社会的动态联合，促进高等教育形成多元发展态势。

竞争是高校实力提升的基础。**“双一流”建设应打破身份固化，打破一劳永逸的“标签化”思维**。一流的身份并非终身享有，而是可进可退、动态调整的。“双一流”建设应辐射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

校，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双一流”。只有这样竞争，才能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重大论断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改革也必须主动适应新的历史方位，主动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促进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在入学机会供给、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历史性成就，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誉，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智力支持和丰沛的人才资源。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与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加公平和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相比、与世界上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类型结构和区域布局上、还是在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上都还存在许多不足，总体上还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过渡期。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理念和重点任务。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高等教育自信是关键。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些人一直缺乏高等教育自信，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以西方的某些理念、制度、模式、经验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言必称希腊”现象：以西方高等教育为标准，西方大学里有的我们不能没有，西方大学里没有的我们也不应该有。高等教育自信不足，使得一些人对于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的理念认识不深，导致对何为一流大学、何为一流学科、如何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一些人习惯于用一些世界大学排行榜来理解和判断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其实，这些排行榜过滤掉的恰恰是大学及其各个学科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界要推进“双一流”建设、使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首先必须解决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自信心不足、自主性不强问题。

高等教育自信从内涵上讲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我国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传统、培养目标、发展道路、体制机制、学科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等所拥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方面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等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自信。前一方面的自信直接属于教育方面的自信，是高等教育自信的核心内容；后一方面的自信则属于社会和国家方面的自信，是前一方面自信的重要保障。这两个方面的自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我国高等教育自信。树立高等教育自信，必将极大激发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活力，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当然，强调高等教育自信，并不是说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不需要向世界上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学习、不再借鉴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经验，而是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明确自己的价值和使命，要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博采众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为世界高等教育新发展积累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树立和提升高等教育自信，必须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高等教育自信的坚实思想基础。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自觉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美好期盼来审视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立足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不断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建立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和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弘扬中国古代教育和近现代高等教育优秀传统、汲取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价值、体现中国精神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

十九大后首次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1 月 20 日下午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精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

李克强、张高丽、汪洋、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等文件。

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深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要重视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

会议指出，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要遵循医疗卫生服务和临床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坚持政府主导，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创新全科医生使用激励机制，加强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担当和勇气，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形成了一大批改革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坚实基础和有利

条件。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改革方向，继续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部署了一大批力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同时，还要继续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落实，改革的担子越挑越重。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要抓紧梳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举措，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持工作力度和连续性，有计划有秩序推进落实。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化落实责任，结合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推出改革方案的要狠抓落实，还没有完成的改革任务要紧抓快干，已经落实方案的还要巩固改革成果。要坚持一把手抓改革，重视搞好调查研究，善于研究和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在抓落实上投入更大精力。明年改革工作要抓紧谋划起来，用更高的标准抓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微言教育，2017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大学作为知识分子云集之地，青年才俊造就之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理应承担重大使命。

基于长期观察和在北大、清华的实地调研，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未来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大学从本质上而言是文化机构。建基于欧美大学模式之上、运行于儒家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我国现代大学长期纠结于中西高等教育理念之间的差异。我国顶尖大学承载着融合中西精髓、孕育中国模式的文化使命，从这一角度观察，一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文化试验正发生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之中。

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它将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从而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种从文化使命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世界性意义进行的理解和阐释，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及其世界性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2003 年位居全球 500 强的我国高校只有 9 所，2017 年上升到 45 所。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大学发展却始终纠结于自身的文化认同。

中国现代大学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西式学堂，目的在于学习西方以强国，与本土文化传统关联较少。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大学理念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之中：一方面，现代大学在建制上基于西方大学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仍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发挥影响。

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极其明显：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强调知识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从苏格拉底所开启并在柏拉图时代得以奠定的对知识和伦理加以反思的知识论传统。而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知识，尤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个体与集体的结合，强调学校与政治、社会、自然的结合。两种文化传统尚未实现很好的调和，这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显著地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

根据 2016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位居全球前 200 名的我国大陆高校有 19 所；在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有 41 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 200 名的中国高校只有 3 所。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沿循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极大影响。东亚诸社会都在与西方大学模式的碰撞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困难。例如，日本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窘境。然而，纵观世界，在西方大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除东亚之外的其他非西方社会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我国及其他主要东亚社会的成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如何将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融合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高校面临的文化使命。

实现这一文化使命极有可能推动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的产生，不同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现象，将以二元甚至多元文化为其最主要特

征。践行这一文化使命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一场文化试验，探寻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可能性。

在今日我国大学校园中，大量有益的西方价值和经验已经融为我国当代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在努力避免西化的同时，更表现出强大的“化西”能力。这种学习他人的态度和能力在人类文化日趋融合的全球化时代至关重要。

基于对国内外高等教育的长期观察，以及在北大和清华对学者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的实地调研，笔者认为，尽管全面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在我国顶尖大学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中西高等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的迹象。

中西高等教育理念融合的文化基础

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中西大学理念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在长期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之后，我国并未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一直试图处理好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与我国文化及历史境遇高度相似的日本在面对外来西方文化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便积极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将西方知识与自身传统并置，而不是加以融合。日本的策略在短时间内显得成功，但从长远角度看，则没有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自19世纪后期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分离始，我国一直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斗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主张保留基于伦常规范的经学传统以维护中华文化之“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之“用”。

在西方文明逐渐强盛的国际背景下，尤其是五四运动后，“体”“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国文化传统遭遇了极大的边缘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及与西方的交流更加密切，我们对外

部世界愈加了解，在面对时也更有自信。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具备在各领域发挥更大积极作用的可能性，这为中西高等教育理念的深层次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中华文明蕴含着包容的智慧。相对于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我国文化传统中“天下”的概念更适合今天唇齿相依的国际共同体。我国众多的民族以及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多元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受到威胁的当下，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精神能够为重构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开放、包容的文明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辩证地看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从矛盾中找到转机。

这一点对于缺乏文明融合历史的国家而言，既难以领会，更无法付之于实践。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王英杰教授曾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今西方研究型大学模式比作一栋由许多彼此不相通的房间组成的别墅，这种联系的“割裂”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导致了学科之间、教学与研究、知识传播与人格培养以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而中国文化能够促进人类与世界的融合，平衡个体、社会和自然环境；学习与生命的融合，协调个体目标、国家目标和全球目标；德行与知识的融合，使得德行的培育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之一；知与行的融合，实现实践与理论能力并重；以及对话模式下教与学的融合。

再次，中国人灵活变通的思维特点使得我们善于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国知识分子不易陷入中西高等教育理念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相反，他们可以灵活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三流院长强调效率，二流院长注重管理，一流院长关注文化”，北大一位院系领导在访谈中如是说。在此，“文化”“管理”和“效率”都体现出中西价值的结合。与之类似，清华一位有着工商管理背景的学者评论道：“如果你仔细观

察我国当今成功的企业家，从他们身上既能看到中国式的自我管理，或者说是修身，也能看到西方式的商业管理。”

中西高等教育理念融合的迹象

对我国而言，现代大学是舶来品。我国传统高深学问机构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只有一些粗浅的相似。近代以来受赶超心态的支配，对西方大学理念的采纳主要出于功用的目的。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紧迫的现实需求搁置或掩盖。

然而，经过长期艰辛地对西方模式进行本土化的努力，我国高校已开始有所丰收。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立足自我、博采众长的意识和能力已在我国顶尖高校中有了显著体现，其学术精英及管理人员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深刻的思考和洞察力，并且已经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加以融合。

首先，现代大学执着追求高深而纯粹学问的理念在我国逐渐扎根。在个人层面已经根深蒂固，正如清华大学一位受访学者所言：“我们必须追求和捍卫真正的学术。没有了这点，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在院校层面，对这一基本理念的认同也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在我国大学领导人员的各类演讲和报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家政策层面，这一理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受访学者大多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赋予大学的自治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为高校和学者的学术探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主要西方社会中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着变化，日益受到市场与政府的干预。传统上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大学管理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

其次，我国学者和高校管理者表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探寻自身文化认同的使命感。在谈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来自于清华和

北大的两位学者分别说道：“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只是时间问题，虽然很难具体地说要到什么时候，但我们充满信心。一旦达到某种水平，我们会有自己的特色、经历长时间发展形成的独特性”；“我们不可能照搬牛津、剑桥、哈佛的经验，我们将在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

尽管目前仍然很少有人能够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发展之间建立起清晰的理论联系，但对于从中探寻中国大学身份认同重要性的认识已得到广泛认可。正如北大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在对比了我国现代大学和牛津、剑桥的历史之后所指出的，“中国大学需要更多时间来形成自身的文化、理念和认同”。另一位受访学者做出如下分析：“我们需要有对自己文明的理解，才能为学术工作和学术生命提供内在的支持。赶超的心态是功利的、不够科学。我们的规划和政策不应被这种心态所主导。随着今天国家的发展，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定位我们的大学。”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目前仍很少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这也在笔者对清华和北大两所顶尖高校的学术精英和院校领导进行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表达出坚定的信心，但几乎没有人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清楚阐释自身的发展经验，及其与西方大学的不同之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观察和指导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即关注我国顶尖高校的文化使命。当国际学术界仍然普遍认为中西高等教育理念难以相容之时，我国最顶尖高校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表现出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可能性。相比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观察高等教育发展的

经济和政治视角，文化使命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世界性意义。

(微言教育,2017年11月20日)

【高教观点】

新时代，如何推动教育治理与教育法治

当前，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跨界融合，推动了“学习的革命”，催生出诸如在线课程等教育新业态，这些都对教育治理变革提出新的挑战 and 机遇。日前，由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发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法制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承办、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中国教育法治与教育发展高峰论坛”在华东师大举办。围绕“教育新业态的发展与教育法治”这一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教育治理需要“随时而动”

任友群：党的十九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了党章，强调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调治理观念、治理手段的动态发展特征。法治是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是治理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治理观念、治理手段的集中体现。教育治理需要“随时而动”，教育法治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治理观念的变化不断调整。

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一般认为，这种活动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主体中发生的。与这种教育观伴生的教育治理观的核心实际上通过对教育主体、教育空间、教育时间、教育内容的管理，使教育活动的开展更为有序、发展更为健康。客观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较于其他领域，教育的形态变化并不大；但这种局面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开始改变。互联网时代，不断加速催生的新发展需求、新技术手段正在“釜底抽薪”式地重构着教育的主体、环境和内容。

王烽：学习需求一旦被开发出来，就再也难以满足了。过去几千年中，学习的权利和学习需求一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有的，人们设立了各种经济的、知识的或能力的门槛，作为开始学习或进一步学习的前提。近一百年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极大降低了人们学习的门槛，但是获取各级优质教育的门槛还是坚固地存在着。同时，普及教育极大开发了大众进一步学习的需求，导致多样化学习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

在强力推进教育普及的过程中，世界各国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基础教育阶段政府举办的教育成为主导、占据了大半江山，高等教育则不同国家各有千秋。然而，普及和免费后的公办教育立即面临供给相对单一与需求日益多样化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向社会、向市场寻求答案，尝试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委托管理、公办民助等改革。与此同时，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社会力量办学则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民办教育冲击着公办教育，营利性教育冲击着非营利性教育，校外补习冲击着学校教育，各种教育资源公司冲击着学校。

信息技术似乎开始就是以主流教育的“替补”身份出现的，从函授、广播电视到网络教育，一直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为那些没有获得学校教育机会的人提供通道。然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人们开始向网络寻求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通过网络学习顶尖名校课程，或将优质资源传播到边远地区。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终端的发展开始提供一个广泛存在的学习环境、个性化的学习选择、交互的学习方式、虚拟社区化的学习生态，进入学习的各种门槛开始“坍塌”。

随之开始“坍塌”的，是“一张试卷、胜者为王”的游戏规则和升学阶梯，是书本为本、课堂为中心、班级授课的工业化教育生产方式。

在这样的教育变革开始之际，一个重要的概念出现了，那就是“教育治理”。我们所说的治理，与传统管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多元参与。社会化学习时代，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单独提供所有资源、并让每个人都满意，必须把学校、社会、家庭、教师的活力激发出来，把社会提供教育资源和参与教育管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的网络，这就是“简政放权”。

张志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张志铭：教育法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提出教育强国、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诸项要求，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法治不能缺位。

2 新时代教育治理要立足有序、开放和共享

任友群：今天，教育的面貌正在发生快速且巨大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治理和法治的观念、方式已显得捉襟见肘。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变化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教育需求的普遍化。随着知识迭代速度的不断加快，学校教

育在社会整体教育需求中的权重正不断降低，终身教育正实实在在成为个体的现实需要。可以预期，针对不同人群需求与特点的教育形态在未来的发展将更为蓬勃，边界将更为模糊。在这种形势下，教育行政部门管教育、人力资源部门管培训的广义教育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已有不能适应之感。

第二，教育主体的多样化。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场域的进入更为便利；可以预料，未来教育从业者的外延将远远溢出今天“教师”的范畴。另一方面，各种“虚拟教师”的出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今天，利用慕课、微课实施教学已不是新闻，甚至有人借助技术成为“独立教师”，而各类软件应用已成为不同人群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未来还可能出现“机器人教师”，在这种技术语境下教育主体的认定都将成为问题，管理模式岂能不变？

第三，教育时空的多元化。从时间上来看，人类一生的教育时段、工作时段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个人从学校走向职场，或从职场重新回到学校已屡见不鲜。为了因应这种情势，斯坦福大学已启动“开环大学”计划，各类教育从“闭环”走向“开环”也已是大势所趋。从空间上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校园/教育”这样的对应关系已被解构。2012年创办的密涅瓦大学，没有校园，其教学主要在网上开展、在全球进行，却依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事实上，教育的“全球时代”已然到来，而对教育的“全球治理”也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教育内容的“镶拼化”。以往的教育更加强调知识的体系性、完备性，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根据个人需要，以“问题”为线索，超越学科界限的学习模式正在兴起。这种变化开始挑战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以“文凭”为中心的教育组织模式，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也因此

应运而生。怎样从“文凭主义”走向“能力主义”也是教育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教育信息的弥散化。教育需求愈加普遍、教育途径愈加多样、教育实施愈加便利，教育信息也就愈加弥散。这也导致了教育领域信息安全和法治形势的日益严峻，怎样在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兼顾数据的有效利用，形成可控、有序的数据开放与数据共享的局面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

袁雯：“互联网+”教育的治理变革，首先应该是对“互联网+”教育新形势和新特征的回应。“互联网+”教育，会促进教育的结构性变革，教育的资源供给、价值评估、成长服务，将更多会以互联网为平台配置要素。海量资源，巨量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以及多元复杂的信息获取渠道，这些方面，已经是我们传统的教育管理所难以应对的。

王烽：治理的精髓是“共建共享”，政府需要把利益相关者转变为责任主体、转变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这就必须同这些参与者平等协商，少用行政命令、直接指挥，多用宏观管理、规则引导和利益激励，体现法治和契约精神，这就是“转变管理方式”。当然，好的治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共同愿景”。社会化、网络化学习已经不再支持培养考试机器，“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让人人都能接受适合的教育”，要成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每一个参与者共同的愿景，“教育治理”才能成为一场伟大的“共谋”。

3 教育治理重在联合共治和价值引领

袁雯：互联网产业具有内在特征，比如：信息对称，去除中介；追求效率，快速迭代；关注眼球，忽视真相；系统开放，协同进化；成员平等，结构扁平；跨界合作，资源共创，用户至上，体验为王等等，这

些特征与教育深度融合，将为教育打上深深的互联网烙印，同时也对教育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我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治理，要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是联合共治，价值引领。互联网时代，共建共享必然需求共管共治。教育治理再也不能是政府一家的事情。“互联网+”教育要求政府变垂直管理为主转向协同共治为主。在这个协同共治的系统中，政府要注重价值观注入，要善于把价值观以互联网的规则注入互联网世界。对教育服务机构，要通过政策约束和促进形成社会责任引领的企业自我管理。

第二是营造环境，协同进化。政府要注重环境的营造，比如基础设施环境、宽松的文化环境，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舍得花钱为互联网教育生态系统注入动力，善于激发企业的创造力，激励市场配置资源，解决政府关心的问题。比如，变政府开发资源、购买资源，为政府奖励资源的创生者，贴补个人的购买花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个人和组织，局部与整体，上下游角色和各种要素均衡配置、协同发展。

第三是要制定规则，守住底线。政府在协同共治生态系统中，要成为规则制定者。互联网企业通常具有野蛮生长的特征，这时候，政府就要果断站出来，担当规则的制定者、学生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捍卫者。通过规则优胜劣汰，促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发展。

守住底线，营造环境，激活动力，注入价值，我认为以上是“互联网+”时代教育治理的核心。

张志铭：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遵循现代教育规律，健全完善教育立法，严格执法守法，明确当事者预期，规范各方行为，构建权责利统一、权利义务相称、各方协同的教育法治秩序，在“互联网+”时代

仍属当务之急。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治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要求有针对性地健全完善相关立法。如，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学校的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也呈现多样化，亟须尽快制定《学校法》，调整学校的组织形态和设置标准，同时也呼唤《终身教育法》的出台，明确界定学校体系之外的各教育主体的地位，建立开放的社会化课程研发和认证制度。在学前教育、教育考试、家庭教育等方面也需要进行立法，对已有的法律如《职业教育法》中不适时的内容也亟须修订。此外，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应加强教育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另一方面又需注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利用问题。要加强教育数据方面的立法，明确政府、教育部门在学生信息、教育统计数据等教育数据使用中的权力和边界，为教育数据的采集、分析和运用提供规范基础。

积极构建合理有效的教育治理和法治实施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转变职能，由注重体制内的学校管理和事业发展，向注重对教育行业和产业实施监管转变；由侧重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直接管理向侧重运用法治手段实现有效治理的转变，积极利用大数据和网络，实现扁平化管理和实时的评估与监测，构建多元参与、开放共享的教育治理机制。应加强重点领域的综合执法，针对学校违规办学、教育培训市场乱象、侵犯学生权益、教师违背师德规范等行为开展联合执法；完善教育行政执法程序，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行政执法案卷归档和评查制度，重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推进执法规范化。

健全教育法律纠纷解决制度。具体包括：建立教育调解制度。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教育调解机构，调解学校与社会、家庭与学校、教师与

学校、学生与学校和教师的矛盾纠纷。完善教育申诉制度。当前我国学生和教师的申诉权只是由《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对此，应尽快出台教育申诉实施办法。建立教育仲裁制度。随着学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教育领域的各种冲突与纠纷在增加，建立教育仲裁制度作为衔接申诉与诉讼的纠纷解决途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应当尽快依据《仲裁法》的规定建构教育仲裁制度。完善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不够清晰，司法实践中诸多教育行政诉讼案件都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教育权益，应合理扩大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任友群：根据我的观察，近期发生的一些教育热点事件、热点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互联网的背景，如何界定、解决这些问题，现今的政策法规尚未能提供全部答案。提升治理能力、加强教育法治的迫切性可见一斑。

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还是要从主体、环境、内容入手，但其中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的特征而加以丰富。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治理与教育法治，可能有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适用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于安：大学内部基层治理不善导致的管理矛盾，是大学治理成本高企不下和妨碍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使用互联网及其终端设备的经济、便利和普及，为调理这一顽疾和提高大学法律治理水平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现代技术条件。因此应当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终端设备改善大学基层治理，推进依法治校的进程。

（《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日）

高校思政工作的四项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再次提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精神不仅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四项任务，可以说它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提高大学生思想水平是根本任务。

思想水平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广度、深度和精度，思想水平决定了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格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帮助当代大学生站稳人民立场、提升思想广度。从个人利益出发还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绝非无关紧要的私事，而是大是大非的重要问题。站稳立场就是要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必然性，人民群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力量源泉；就是认识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就的应然性，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决群众之所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帮助当代大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升思想的深度。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尽管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因素，但符合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大势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帮助学生掌握唯物辩证法、提升思想的精度。从主观出发还是从客观出发，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还是联系发展地看问题，是唯物辩证法与一切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要全面

客观准确地认识事物，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

提高大学生政治觉悟是核心任务。

政治觉悟具体而言包括了政治信念、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大学生政治觉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认识到政治参与的合法方式与途径，认识到应该坚守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方向。说到底，就是要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培育和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提高大学生政治觉悟需要解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薄弱等问题。有人认为只要自己不从事政治工作，就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可以远离政治。实际上，“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政治决策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政治生活中的任何进步，并非只是少数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提高大学生政治觉悟需要解决政治敏锐性缺失、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敏感等。我们既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也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原本属于政治的问题仅仅视为经济问题或者文化问题。提高大学生政治觉悟还需要解决政治鉴别力差、受到错误思潮侵袭等问题。只有绷紧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根弦，才能及时发现隐藏在各种“就事论事”主张背后的政治动机，才能不被舆论漩涡所裹挟和利用。

提高大学生道德品质是基础任务。

人们在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中总是强调“德才兼备、德在才先”，是因为道德品质和个人才能都非常重要，但道德品质更为根本和基础。个人的才能越高，就越需要加强道德品质的修炼。高校既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地，也是青年才俊造就之所，提高教师和学生的道德品质既是思想

政治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高校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大学生道德品质，关键就是要在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会重视培育核心价值观，都会强调核心价值观不可挑战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核心价值观，民族就没有灵魂，国家就无法凝聚，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汇集了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共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讲深讲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更要通过评选“感动校园人物”“感动社区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等活动引导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向往。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任，也是所有教师的共同职责。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间、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其他教职员工之间，都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示范引领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是重要任务。

文化素养既是综合素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和成就自由个性的重要前提。《大学》一开篇就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真正的学问就在于把握人生的大道理，能够具有天下情怀，能够永无止境地完善自己的德性。尽管大学经历了从博雅教育到学科分化到专业培养的演变，但是“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这一核心理念依然没有改变。大学教育应该着眼于提升生活质量和精神品位，而非相反把人局限在特定领域并使生活枯燥乏味。大学生不仅要牢牢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技能，成为专才；也应该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指明了

方向，也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碎片化阅读和追随点击率成为潮流，文化的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经典原著和深度分析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逐渐减弱。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理论透视各种文化现象，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提升学生追求真善美的境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囊括了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伦理、法学等诸多学科，涉及古今中外的诸多流派。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既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打开文化视野，也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引导学生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让文化滋养大学生的精神生活。

（光明微教育，2017年11月15日）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为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中国特色”这一“灵魂”：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论自觉与教育自信

世界是多样化、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应是丰富多彩的，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现实国情和不同发展方向来进行抉择，而不能走趋同的道路。

只有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才能在服务国家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在认真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大地，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之路。

大学的衡量、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虽然国际上推出了不同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和排行榜，有些方面的指标是共同的、可以衡量的，但有些方面是不同的，难以衡量。

过去我们较为关注大学的共性特征和可以衡量的外在指标，并向这方面努力，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不仅要有这些外显的“形”，更要有内在的“魂”，而这个“魂”没有也无法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一致的路径可以选择，需要根据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制度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寻。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既要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那些外显的“形”，更要有内在的“魂”，而这个“魂”就是“中国特色”。

我国大学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寻求和确立自己的“魂”，把“中国特色”注入到大学建设的“魂”中，体现中国大学的学术自觉和教育自信。

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与体制机制等方面，贯穿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职能中，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传承中国文化与教育理念。中国的高等教育，根植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每一条根脉都接受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滋养。

中国的大学是为了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要以世界一流为标准，瞄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不懈努力奋斗，跻身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林。“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句话十分富有哲理。它揭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大学的真正世界竞争力之所在。我们提倡的国际视野、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是西化，更不是美国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抵制对先进高等教育模式的学习，更不能排斥对先进国家高等教育实践经验的积极吸收，在提取本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关键是要找到转化外国经验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生长点。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体现了深刻的理论自觉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来是各国政府和政党所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关系，涉及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基本性质的认识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方向。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于这一问题，争议很大，有人把教育看作救国救民的唯一希望，有人主张教育要超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外。前一种观点即“教育救国论”，后一种观点是“教育清高论”。这两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有其积极意义，如有利于全社会重视教育，有利于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从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来看，它们是片面的。其理论基础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要么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将人看成是可以脱离社会而可以随意加以培养的人；要么以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为基础，将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于人的高尚道德的培养和良好性格的塑造上。

从其方法论来看，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么将教育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么将教育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发展隔离开来。这些观点在实践上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即没有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①政治经济条件，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属性。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抽象地看待教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以及教育的作用，而是把握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联系，明确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超然于社会之外的教育，也不存在一个可以单纯被教育所随心所欲加以设计和改造的社会，教育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结合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具体阐明了关于教育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基本主张，不仅把发展教育事业看作一种奋斗目标，更是当作一种实现革命与建设事业总目标、总任务的重要手段。

党在每个历史时期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否明确而且行之有效，除了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外，还取决于能否正确反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例如，我们说世界一流大学要具有国际影响力，要在某几个学科、某几个领域站在世界的前沿，强调的是大学在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要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强调大学的服务功能。这两者处于辩证的统一体中，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不可偏废。在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就是要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坚强的人才保障、科技支撑和精神动力。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它应该是民族精神与现代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现代化对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来讲，不过是用各自独特的民族精神来诠释现代文明的成果的产物。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以中国固有社会文化与教育思想为基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等教育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对我国教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现代教育发展有着启迪之处。

从高等教育历史看，现代大学虽渊源于西方的中世纪大学，但在中国古代，早有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最早是于公元前124年，即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的太学。宋代以后兴起的书院也近似于高等教育机构，它得名于唐代，经历了宋元明清的繁荣发展，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高等教育形式之一。它有官办、民办和私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强调自由研讨、教学结合、不同学派互相交流等，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传统与特色。

晚清以降，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现代大学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学习与借鉴、模仿西方大学的结果。但是，中国现代大学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式中国大学教育。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如蔡元培所言：“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现代大学并不是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延续和发展。但却如梅贻琦所讲“制度为一事”“精神又为一事”：“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这实际上是说，虽然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渗透着中国教育理念的本质精神。因此，认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要正确看待与传承中国教育的传统与理念，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基础。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体现了坚定的教育自信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建立一个既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光辉成就，也有曲折探索，从历史经验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42.7%，接近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高等教育质量稳步提高，中国大学正发生着从“陪跑者”到“领跑者”的转变。

2017 年 6 月，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中国大陆高校上榜 1289 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并在 7 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第 14 届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 12 所高校进入全球百强，成为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亚洲国家。

2017 年 9 月，英国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北大进入前 30 名，复旦大学等 5 所高校入围前 200 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主编菲尔·巴称赞，中国大学正在超越欧美的名牌大学，开始真正成为全球精英的一部分。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如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立德树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改革，加大体制机制创新；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等等。这些基本经验是高等教育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成就和基本经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魅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是

我国教育自信的基础。坚定教育自信，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必将崛起，从而成功跨越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困境，并将完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建立起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

(微言教育,2017年11月15日)

【信息摘编】

我科学家斩获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 “戈登·贝尔”奖

17日凌晨，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付昊桓等共同领导的团队所完成的“非线性地震模拟”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该成果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计算机系与山东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成果发表于今年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论文题目为《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 18.9-Pflops 非线性地震模拟：实现对 18Hz 和 8m 情景的描述》，付昊桓为论文第一作者，清华大学的付昊桓、何聪辉、薛巍以及南方科技大学陈晓非院士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地震对社会的生命，经济和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在预测地震方面仍然束手无策。地震巨大的破坏和毁灭能力不断驱动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去研究、模拟，甚至预测地震。大地震模拟的日益精确，不仅能为地震后次生灾害发生前的避难、疏散

起到关键作用，也能为地震预测研究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为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做出贡献。

地震模拟工具可以实现对地震发生过程的重现与预测模拟，是科学家理解地震发生与传播规律的重要手段，对于降低与预防地震灾害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工程师来说，地震模拟结果还可以与其它技术结合，对地震高发区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合理规划与设计，以提升城市规划的安全性，防患于未然。

基于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项目团队成功地设计实现了高可扩展性的非线性地震模拟工具。该工具充分发挥国产处理器在存储、计算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实现高达 18.9PFlops 的非线性地震模拟，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如此大规模下的高分辨率、高频率的非线性可塑性地震模拟。该工具首次实现了对唐山大地震发生过程的高分辨率精确模拟，使得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地震预防预测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由付昊桓为第一作者的“全球气候模式的高性能模拟”研究也入围“戈登·贝尔”奖，两项研究占据了该奖 2017 年最后获提名总数的 2/3。

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设立于 1987 年，由美国计算机协会于每年 11 月召开的超算领域顶级会议颁发，旨在奖励时代前沿的并行计算研究成果，特别是高性能计算创新应用的杰出成就，被誉为“超级计算应用领域的诺贝尔奖”。

(微言教育,2017 年 11 月 17 日)

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聚焦一流本科教学

11月18日-19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中国大学教学》编辑部主办,福州大学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在福州举行。本届论坛聚焦一流本科教学,以“一流本科教学:课程、师生、方法”为主题,与会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200多所高校的千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研讨了一流本科教学,并聚焦课程及教学方法改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的报告。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时,他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上已经进入世界中上水平,开始与国际高等教育最新发展同频共振,世界高等教育开始倾听中国声音、融入中国元素。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是目标,一流学科是条件,一流本科是根本,一流专业是基础,要做好“四个一流”的统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要做好引领、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推动融合、鼓励创新、倡导质量文化六方面重点工作。教育部正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谋划教育“奋进之笔、得意之作”,打好高等教育提升质量、促进公平、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攻坚战。近期将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即卓越工程人才、卓越法治人才、卓越新闻人才、卓越医生、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教师以及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的拔尖计划升级版,推动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吴岩强调,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我国高等学校传统课堂教学短板仍然明显,教育部将以认定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契机,以全面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为抓手,以教育技术现代化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掀起一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和教学变

革，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变轨超车”。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张大良副会长表示，本届论坛是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的热潮中召开的，论坛主题抓住了一流本科课程这个关键，聚焦教学方式方法这个重点开展研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张大良副会长感谢各界对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教学论坛的支持，感谢主办方和承办方的努力和付出，希望各高校要围绕“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才”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中国高教学会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国龙表示，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既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实践做法，又是推动大学回归教学基础地位的重要举措。希望福建高校切实以一流人才培养为目标、一流专业建设为核心、一流本科教育为基础，走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展现福建风格，发出福建声音。

福州大学校长付贤智院士在论坛上表示，承办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给了福州大学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有力地推动福州大学“双一流”建设和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周爱军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杨祥理事长、南京大学王志林副校长、东南大学孟桥教授、福州大学党委陈永正书记、厦门大学邬大光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冯晓云副校长等多位领导、专家，围绕论坛主题，分别就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时代课程教材研究、一流本科教育实践探索、在线开放课程群建设构想、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践、国际视野与一流本科教育、课程质量提升

机制构建等议题作大会报告。

“中国大学教学论坛”自 2008 年创设以来，每年选择一个主题，聚焦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热点、难点，持续组织高教界交流、研讨，是国内高等教育界知名论坛。论坛为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研究人员和骨干教师搭建了交流新理念、新探索、新体会的高层次、大规模教学研讨平台，十年来每届论坛都得到了高教界的热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中国高等教育,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主 编： 张大林

执行主编： 王 迪

编 辑： 张羽岚

呈： 校党政领导

发： 全校各单位

贵州大学学校办公室
